

高华

◎著

珍藏版

新史學

叢書

革命年代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

高华
◎著

珍藏版

革命年代

新
史
學

叢書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年代/高华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1 (2012. 6 重印)

(新史学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194 - 8

I. 革… II. 高… III. 中国—现代史—文集 IV. K260. 7.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4453 号

选题策划	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	余小华 肖风华
封面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45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2 版 2012 年 6 月第 7 次印刷
印 数	28001 - 3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194 - 8
定 价	4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售书热线: 020 -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 83781421

“革命年代”是高华的研究对象，也是那一代人共同遭逢的时代。当大多数人都只在通过当下体验生活时，真正的思考者却能超脱自身的不幸与苦难，在知识积累和命运变迁中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具备现实洞见力与穿透力。从这个意义而言，高华提供的是一种深刻的认知。同时，他无功利的回望姿态也凸显出了当下日益稀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曹霞·《对那个远去的年代的思考与追索——读〈革命年代〉》

从党史出发，追寻一段真实的现代史，不啻一场理性的冒险。《革命年代》是这一场冒险的成果……高华说自己顺着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他的宿命是，自己的文章可能归类于“历史考古学”，结论无甚意义。但是，无论如何，高华充当了真相的摆渡者，让很多人，免于跋涉在荒诞的故事里。

朱桂英·《真相的摆渡者》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已经渐行渐远、而革命者曾经标举的理想主义气质与批判精神越来越稀薄的今天，重访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华教授的新著《革命年代》直接地给我们这些“后革命产儿”提供了一种进入革命历史与革命记忆的途径。

唐小兵·《革命年代的重访与超越》

如果说《革命年代》中最让人惊心的文字是“‘新人’的诞生”和“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等直捣政治话语和政治动员机制之核心的那些篇章，那么最让人动情的文字，则是其前言和后记，那是一代人家国情怀和个人半个世纪心灵史的呈现，是“那一代人的怕和爱”——革命往事，要付出多少勇气，才能对你念念不忘？

尹钰（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所教师）

高华的现当代史研究在思想上的巨大感召力首先来自于他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勇气，从理想主义的道德批判精神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品格，这正是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赖以建立的稳固根基。在民间立场的研究话语体系的入口处可以刻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李公明·《行走在历史的河流——高华的学术遗产与思想效应》

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是史学的，又超越了史学，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我最敬佩高华的，是他的贯通能力，擅长将支离破碎的个别史实，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从复杂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能够将历史读通的史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一个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识人。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阅读高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革命年代》，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高华未必完全赞同“历史是建构起来的”，但他对历史建构者的叙事策略与修辞用心了然于心，他的写作如同手术刀那样，总是精确地去除遮蔽，将不为人知的真实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

《时代周报》

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总序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代前言

他用小故事讲清了大问题

杨奎松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时，时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是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是我要知道这是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之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

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他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接到凯平的来信后，我就开始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高华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很洪亮，他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同学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须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还是我们前次探视时的几位：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和我。仍有一两位教授因事当天无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据他和太太讲，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而且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当时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为高华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说：“没问题。”他接着指挥小刘把床头摇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道：“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拿相机的显示框显示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

他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一块发给他看。小刘也再三说：你们回去从电脑上把照片发过来就可以了。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参加《看历史》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到过高华了，因此她向我仔细地询问了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点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里面说“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进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级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攘攘，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东师大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东师大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连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东师大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东师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东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离了；在学校的帮助下，高华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

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东师大、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东师大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兆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世纪80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是敏感问题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〇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

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的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六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我们

《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三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青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①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分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阶级路线”的压力。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我所在的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12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计的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但是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加上那时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很少，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看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

^①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

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镠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小学生，但因为父亲是“右派”而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干，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大名鼎鼎的、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二十四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篷布里，到了苏州，在车站的小广场转了一圈，再爬上同一辆货车回到了南京。这一次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面”，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地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箩”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青少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虽然在内心一点也不认同眼前四处弥漫的暴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是共产理想主义仍然焕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